
“扩权强县”与经济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袁渊 左翔*

内容提要 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步施行了以财政“省直管县”和
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县的“扩权强县”试点改革。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利用浙
江、福建两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对“扩权强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
验。结果表明，“扩权强县”对浙江省县辖企业的发展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但是无
论是回归系数还是显著程度，对县辖区内的非国有企业的影响都要高于国有企
业。这说明，“扩权强县”不但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同时对市场化改革有正面作
用。

关键词 扩权强县 分权结构 双重差分 企业增长

一 引言

在由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增长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对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大国，中央政府不可能拥有各地区所有的信息，因而在提供公共品、具体政策实施和国有资源的使用上必须依赖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的激

* 袁渊：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上海市国定路 777 号 200433 电子信箱：yuanforeve@gmail.com；左翔：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本文得到“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研究基金（项目编号：CXJJ-2010-326）”的资助。同时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70972060、71072036）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0JJD63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我们同时感谢上海财经大学汤云为及上海财经大学论文报告会、复旦大学论文报告会、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各位评论老师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励结构成为解释“中国增长奇迹”的主要思路之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 财政分权与行政上的垂直管理体制是让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保持激励的主要制度安排。税收留成让地方政府能从 GDP 增长中获取财政收入; 而 GDP 锦标赛作为官员晋升模式, 为地方首长提高经济增长提供了个人激励 (Li 与 Zhou 2005; 周黎安, 2004, 2007)。这种制度安排让地方官员“企业家化”成为分析“中国增长奇迹”的主要政治经济学框架 (张军, 2007)。

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激励提高以后, 理论上对经济发展正面作用的渠道在于: 首先, 早期的财政联邦主义文献认为, 地区之间居民的偏好是异质的, 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居民的偏好有更多的了解, 因而在提供公共品上具备信息上的比较优势, 利用资源的效率也更高 (Tiebout 1956; Musgrave 1959; Oates 1972)。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 公共品不但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也包括打破计划体制下的全国“一刀切”的政策, 建立更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制度安排。其次, 放权之后, 为了保证辖区内的经济增长而导致的对生产要素和居民的竞争, 地方政府会做出保护产权的可信承诺 (Qian and Weingast 1997) 和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等制度创新 (Qian and Roland 1998), 对中央政府的干预主义造成制衡和约束, 即形成著名的“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 (Weingast 1995; Montinola et al., 1995; Qian and Weingast 1996; Cao et al., 1999)。最后, 相对于俄罗斯等国的 U 型政府组织结构, 中国 M 型政府组织结构不仅能在一定条件下对地方政府提供更好的激励机制, 同时也更有利于小规模试验和走渐进改革的道路。^①

从经验研究来看, 除 Zhang 与 Zou (1998) 及 Jin 与 Zou (2005) 以外, 大量文献都认为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Lin 与 Liu 2000; Jin 等, 2005; 周业安与章泉, 2008)。特别是分税制改革, 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扭转了财政分权部分不利影响, 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张晏和龚六堂, 2005)。

与此同时, 由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推动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也日益受到重视。政府的作用是多维的, 仅使用 GDP 和与之相关的税收作为惟一度量业绩的方式, 让地方政府仅注重基础设施建设, 忽视科教文卫等民生工程的投资 (乔宝云等, 2005); 为了保持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也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选择。同时, 初始禀赋的区别会造成地方政府对公共品投资激励的分化, 进而扩大了区域之间

^① 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按照工业部门来组织的, 类似于企业的 U 型结构, 中国政府是按区域设立地方政府来组织的, 类似于企业设立子公司组织的 M 型结构 (Qian and Xu, 1993; Qian et al., 1999; Maskin et al., 2000)。

的收入差距 (Cai and Treisman, 2004, 2005)。另外,地方分权也是造成宏观经济波动 (周业安等, 2004; 傅勇与张晏, 2007)、高能耗和高污染 (王永钦等, 2007)、土地违法 (梁若冰, 2009) 等问题的重要原因。

在地方官员 GDP 锦标赛晋升激励和中央权威政府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下,如何优化地方分权方式和路径日益变得重要。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文献相当缺乏。近年来,省级以下政府财税体制“省直管县”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优化政府管理层级和各级政府经济权限的重要步骤,也为我们研究地方分权结构提供了极佳的案例。

相对于其他省份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实行的“省—市—县”行政管理结构,浙江省从 1992 年就开始将部分地级市财政权力和行政权力逐步下放到县;山东、湖北、湖南、辽宁、河北、江苏、河南、安徽、广东、江西、吉林等省及自治区从 2003 年开始也在局部实行了以“扩权强县”为核心的“省直管县”试点改革。2009 年 6 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规定到 2012 年底前,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将县级财政跨过地级市,在确定收支、转移支付、财政预决算、资金往来和财政结算方面与省级财政对接。对已有试点绩效的研究不但能为未来的全面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政府分层和权力结构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提供一个转轨国家的新的证据。

与本文最接近的研究是才国伟与黄亮雄 (2010),他们选取了中国 500 个县 2000 ~ 2007 年的数据,考察了财政“省直管县”和扩大县政府经济管理权限试点的影响因素和绩效。与他们使用宏观数据的研究相比,本文的特色在于检验“扩权强县”对县辖企业发展的作用。^①之所以从微观角度研究,原因在于:首先,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企业绩效的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②区域经济总量的良好表现毕竟是由微观企业绩效增长加总而成的,县辖企业绩效能较好地反映县域经济发展。其次,理论上对生产要素的竞争是“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成立的主要渠道,而现实中县辖区内原有工业基础一般较薄弱(相对于市而言),招商引资因其在提高本地区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增加税收等方面效果最明显,已经成为许多县政府的优先选择。“扩权强县”对经济发展如果存在正面作用,其各种机制大多是通过转化为较好的投资和企业生存环境,进而提高企业的绩效来实现,通过企业层面数据能更深入地检验这一理论体系成立的微观机制。再次,地方政府对企业行业管制、税费收取和信贷支持等方面的微观政策会对企业绩效有深刻影响,显然这些政策

① 县辖企业指注册在县辖区内的企业,市辖企业指注册在市(区)内的企业,后文的定义与此相同。

②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浙江省和福建省,两省工业产值占 GDP 比重 2003 年后都在 50% 以上。

对不同企业的影响是不平衡的。因此,企业层面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政府行为对不同企业发展的结构性影响,进而能更为细致地考察转型国家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最后,从计量方法上看,由于企业对于政府试点改革选择的影响力较小,同时以地域作为划分企业是否受到改革作用也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因而能对改革的效果做出一致性的估计。

现有的财政“省管县”试点改革在不同的省份方式存在区别,我们选择实施较早,体制比较成熟的浙江省为研究的对象。由于“扩权强县”制度类似于一个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或准实验(quasi-experiment),本文在分析策略上借助双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方法消除不可观测变量,比较干净地验证了它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检验发现:“扩权强县”对县辖企业的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无论是回归系数还是其显著程度,对县辖区内的非国有企业的影响都要高于国有企业。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简要分析当前“省-市-县”分权结构的弊端,介绍浙江省“扩权强县”制度背景;第三节介绍计量方法和指标设计;第四节报告经验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并分析其成立机制;最后是结论。

二 “扩权强县”改革的制度背景

(一)“省-市-县”分权结构的形成背景及缺陷

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层级最多的政府体系和行政区划体系,包括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地级市、自治州)、县(县级市)和乡(镇)共5级。

历史上市与县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城市化水平差异,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同一级。1982年开始,为了打破计划经济以来市县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格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农村拉动作用,全国各地行政体制实行了“市管县”的改革。^①有关资料表明,截至2004年年底,全国334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中,已有269个“市管县”形式的地级市,占全国总数的80%以上,地级市管辖的县数量占全国县总数的70%。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早期,地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协调者,体制上最大的好处是降低了省政府需要协调庞大数量县市一级政府引发的信息收集成本问题,而以城市作为区域发展中心的非平衡发展战略也对当时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① “市管县”有以下6种形式:以原来的地级市为基础,划入几个县;地市合并;地改市;给原来不领导县的市划入几个县;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划几个县归其领导;将县直接升格为地级市,实行市管县体制。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市管县”的弊端日益显现。在财政分权和官员 GDP 锦标赛晋升激励下,市与县存在“同构”辖区竞争的关系,而市对下辖县资源特别是财政资源的整合是以行政权力为导向的,这不可避免的出现机会主义倾向。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所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幅上升,扭转了之前财政过度分权的种种弊端,但由于上级政府的政治优势,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逐级向下,最终落到县、乡等基层政府。

市政府不但将财政压力作为征收指标下达给县政府,现实中,还采用以下两种渠道集中县财政资源:第一,通过政治上的优势,将县辖区内盈利能力较强和税基较大的项目留在地级市。既减少了县财政收入,也降低了县级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第二,随着财权向中央集中,转移支付变得至关重要,^①而市政府也往往截留财政拨款和指标,“漏斗财政”、“市刮县”的现象比较普遍。以湖北省为例,2003年湖北实行“省管县”改革前,全省市本级通过财政体制、结算集中和截留省补助资金等方式集中县(市)财力 3.3 亿元,平均每个市约 2000 万元(张通等, 2006)。

上述情况加剧了县级财政,特别是贫困县财政的困难,降低了县级政府公共品投入。^②当前大量经济欠发达的县财政收入十分紧张,通常还需优先满足行政费用和机构工作人员的收入支出,于是预算内支出往往仅能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转,普遍存在“吃饭财政”现象。与此同时,省以下各级政府仍然承担着辖区内大量公共品的提供职能,于是便出现基础政府权责不对等的状况,导致科教文卫投资严重不足,^③这无疑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当市级政府下达的财政指标或自身的支出难以完成时,基层政府的职能部门可能会通过名目繁多的制度外收费来弥补,这种征收往往因为政府自由裁量权较大而以隐性和不可验证的情况出现,容易出现侵犯私人产权、掠夺市场微观主体的倾向,恶化了企业的生存环境。已有研究表明,分税制改革和财政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有深刻影响,其对市场的“援助之手”转变为“攫取之手”,而前者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陈抗等, 2002)。

综上所述,当前“市管县”财政体制抑制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而以“扩权强县”为核心的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有逆于上述过程,因而可能更有效率。值得注意的是,“扩权强县”也可能弱化地级市作为地区协调的功能,从而使地方分权的弊端进一步扩大。比如

① 陈锡文(2002)的研究指出,1999年中国县级总支出中约有 40%来自转移支付。

② 关于各级政府财政状况,有一句顺口溜概括得比较形象:“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市财政勉强勉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喊娘”(陈锡文, 2002)。

③ 例如,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可以概括为“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县级财政的困难必然导致基础教育投资不足。乔宝云等(2005)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程度与小学教育投入呈负相关关系。

县级政府的恶性竞争会加剧, 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会出现在县际之间, 进而减少了地区分工的好处。因此, “扩权强县”是否能提升效率仍然需要较严格的检验。

(二) 浙江省“扩权强县”制度背景

由于历史上国有经济薄弱, 城市经济并不发达,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行政体制改革中, 浙江省尽管也增设了地市级政府, 但在财政结算关系上仍然保留了“省直管县”, 这大大削弱了行政“市管县”的效力, 结果便是扩大了浙江省县级政府的财权和经济管理权限。

在财政体制上, 浙江省长期以来县(市)财政与市(地)财政一样都直接同省在体制上挂钩, 市(地)一级不与县(市)或所辖县市在体制上产生结算关系。财政指标由省直接下达。转移支付直接从省返还到县, 杜绝了市政府从中截留的现象。在此基础上, 浙江省针对“省管县”后, 县级财政收入的来源往往比较单一, 面临较大风险的情况, 出台了不少类似保险和激励的制度创新。首先, 在税收留成方面, 从 1994 年起, 市、县财政提高了“两个 20%”, 即地方财政收入增收额的 20% 留存到市、县, 同时税收返还地方财政增加额的 20%。其次, 浙江省适当照顾少数贫困县和海岛县。1995 年后对 17 个贫困县和次贫困县(后扩大到 30 个市、县), 实行“两保两挂”政策。^① 2003 年, 又对“两保两挂”财政政策做了调整和完善, 市、县在确保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和确保完成政府职责的前提下, 实行省补助和奖励与其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增收额挂钩。这些政策为县级财政提供了保障, 也提高了县级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激励。

当前, 在各省试点改革中, 财政被省直管和县行政经济管理权限扩大通常是同步的。比如湖北省 2004 年在全省范围内实行财政“省直管县”, 并逐步将“扩权县”由试点扩展到全省范围内, 并将须经市(州)审批或由市(州)管理的行政经济管理权限, 改由扩权县(市)自行审批、管理, 其他省也有类似的做法。^② 而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 浙江省就对 13 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了扩权, 内容主要是扩大建设、技术改造和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 1997 年, 允许萧山、余杭实行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2002 年 8 月, 浙江再次深化改革, 省级机关逐步减少了 50% 以上的审批项目。同时, 将 313 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 17 个县(市)和萧山、余杭、鄞州三个

^① “两保”是指确保当年收支平衡和确保完成政府职责(初期为消化历年赤字), “两挂”指体制内补助随地方收入增长的 2:1 比例增长, 个人奖励为地方收入增长的 5%。

^② 例如, 河南省 2004 年出台政策, 将 5 个县划分为财政省直管, 同时明确规定 35 个“扩权县”具备省辖市的经济管理权限, 2007 年又进一步将上述政策扩展到更多的县。河北省 2005 年开始将权限下放到县的改革, 到 2009 年“扩权县”已经达到 92 个, 占全省 136 个县 2/3 规定“扩权县”除了财政省直管外, 具备在项目、土地审批、证照直接发放、部分价格管理的权限。

区,涵盖了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 12 大类扩权事项,这种“直管”还扩展到社会管理职能,如出入境管理、户籍管理、车辆管理等,几乎囊括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的所有方面。次年,浙江省政府又将上述试点推广到省内所有的县。

近 20 年来,以财政“省直管县”为基础,浙江省逐步完善了对县级政府行政性放权和财政放权的制度安排,其效果是比较明显的。2003 年,县域经济所占浙江省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 68%,之后的几年也增长迅速,连续数年有 30 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而与浙江地理位置临近,各项条件相仿的福建,虽然在 2003 年下放了少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到县,但相比浙江改革较为滞后,县域经济发展速度也明显较浙江缓慢,2000~2005 年入围“全国百强县”的数量逐年递减,2000 年 8 个县(市)入围,2006 年仅 3 个县(市)入围。由此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政府治理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①

三 计量方法和指标设计

当前,虽然地方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的正常运营,但在辖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项目审批、土地出让和税费收取等方面仍然具有较大的管理权限和影响力,特别是掌握包括土地在内的关键要素的控制权,可以说对辖区内的市场和企业绩效有决定性影响。^②因此,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结构高度影响着它与市场、企业的互动关系,反过来,对市场和企业绩效的经验研究也就能检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效率。

在此,我们主要验证浙江省“扩权强县”对县辖企业成长的作用。由于诸多不可观测因素(历史、文化以及其他制度安排)同时影响企业发展,在计量方法上,本文通过构造“控制组”和“实验组”,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消除上述不可观测量,进而识别制度差异对企业成长的因果效应。

(一)估计方法

双重差分方法在国内政策评估经验研究中,^③一般以政策实施的时间为界区分实

① 这部分和后文关于福建、浙江县域经济数据分别来自浙江区域网和福建省财政厅网站,网址分别为 <http://www.naread.com> 和 <http://www.fjcz.gov.cn>

② 周黎安(2008)对当前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干预经济能力有详细论述,包括(1)本地经济发展的年度规划和长期规划,制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2)财政资金的支配权和通过政府担保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力以及对地方金融机构(城市商业银行)的巨大影响力。(3)通过制定和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4)项目审批权。(5)土地出让和使用。(6)实施合同和协调纠纷等。

③ 周黎安与陈烨(2005)研究农业税改革、聂辉华与李金波(2006)研究增值税改革以及史宇鹏与周黎安(2007)以计划单列市为例研究地方放权等都采用了双重差分方法。

验组 (treatment group) 的样本是否“被试”。本文的方法略有差异, 采用地理位置来识别企业是否受到“扩权强县”政策的影响。^①

2003年以后, 浙江省大多数县的“扩权强县”改革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而福建省的改革相对缓慢。我们分别以两省的县辖企业作为是否受到“扩权强县”影响的“实验”样本。之所以选择福建, 是因为它的土地面积, 人口规模、文化传统等地理社会环境与浙江比较相似, 而且同处于东南沿海, 其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基本一致。因此, 我们假定,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制度变化对两省县辖企业的冲击是相同的。^②

但仅比较两省县辖企业绩效差异并不足以识别“扩权强县”改革的效应, 为分辨其他不可观测的变量, 我们将样本扩大, 以两省市辖企业作为控制组 (control group), 对其进行差分处理。之所以如此, 是由于两省的地级市在财政上都是与省直接结算, 对市辖区内经济管理权限也相差不大, 市辖企业不受“扩权强县”改革的影响,^③但受到两省历史、文化和其他经济制度的影响。

下面说明具体的估计方法。令 y_{ijk} 表示企业的绩效或发展速度 ($j = 0, 1$, 其中 $j = 0$ 表示福建省, $j = 1$ 表示浙江省; $k = 0, 1$, $k = 0$ 表示市辖企业, $k = 1$ 表示县辖企业, 下同), 根据前面的分析, “扩权强县”改革可能对其有影响, 假设企业增长回归模型是:

$$y_{ijk} = \text{cons} + \beta_j^k x + u_k + \alpha_j + \varepsilon_{ijk} \quad (1)$$

其中 x 是一组控制变量。 x 表示是否进行“扩权强县”改革的虚拟变量, 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估计双重差分系数 β_j^k 。 u_k 表示除“扩权强县”制度影响外, 县辖企业相对于市辖企业异质性的虚拟变量。模型的随机项可以分为两部分, 其中 α_j 表示浙江、福建两省除“扩权强县”制度以外, 在历史、文化及经济制度方面差异。

显然, 由于 α_j 不可观测, 仅用两省县辖企业绩效期望的差分 $E(y_{i11} | x_i u_1) - E(y_{i01} | x_i u_1) = \beta_j^k + E[(\alpha_1 - \alpha_0) | x_i u_1]$ 并不能得到 β_j^k 的一致估计。但我们可以用市辖企业作为控制组 (control group), 通过市辖企业差分 $E(y_{i10} | x_i u_0) - E(y_{i00} | x_i u_0) = E[(\alpha_1 - \alpha_0) | x_i u_0] = E[(\alpha_1 - \alpha_0) | x_i u_1] = E[(\alpha_1 - \alpha_0) | x_i]$ 估计 $E[(\alpha_1 - \alpha_0) | x_i u_1]$ 。后两等式成立, 是因为我们假设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浙江、福建两省不可观测变量 (历史、文化和其他经济制度) 对市辖企业和县辖企业的影响相同,

① 双重差分方法的各种应用详细综述参见 Meyer (1995), 国内赵山与潘孝挺 (2010) 也采用了相似的方法。

② 理论上说, 只要在控制变量后, 企业是否收到“扩权强县”影响是随机的, 选择哪个省的企业作为样本并不是很重要。

③ 中国的企业税收留存地方的部分是与企业的注册地有关, 县级政府并没有激励去提高注册在市里企业的绩效, 所以“扩权强县”只会影响县辖企业。

因而 u_k 与 α 线性不相关。经过两次差分, 我们有 $j^k = E(y_{i11} | \mathcal{X} u_1) - E(y_{i01} | \mathcal{X} u_1) - \{E(y_{i10} | \mathcal{X} u_0) - E(y_{i00} | \mathcal{X} u_0)\}$, 恰好是“扩权强县”效应的一致性估计。因此, 为了估计模型 (1), 将其转化为:

$$y_{ijk} = \text{cons} + \beta_j^k d_j^k + \beta_j d_j + \beta^k d^k + \mathcal{X}'\beta + \varepsilon_{ijk} \quad (2)$$

其中, d^k 是表示企业注册辖区级别的虚拟变量, $d^k = 1$ 和 $d^k = 0$ 分别表示企业注册在县或市; d_j 是刻画企业所在地区的虚拟变量, $d_j = 1$ 表示是浙江省, $d_j = 0$ 是福建省。 d_j^k 则是一交叉项, 表示企业受到了“扩权强县”效应的影响, 根据定义, 浙江省的县辖企业 $d_j^k = 1$, 否则 $d_j^k = 0$ 。

(二) 对估计方法合理性的讨论

从现实中看, 大部分省选择试点改革的县并非是随机抽取的, 而是经过精心挑选。被选择的“扩权县”往往经济基础较好, 财政能力也较强。但也有像江西省那样, 在 2007 年将所有的 12 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试点的案例。这都说明, “扩权强县”改革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 取决于省、市、县政府之间的博弈, 通常来说, 由于内生性问题, 使用县级宏观数据的检验估计的系数是不一致的, 比如说, 谈判能力较强的县本身经济发展的潜力可能较大, 在扩权以后更好的经济表现不一定是由制度变化造成的。

本文的研究从三个方面比较好的避免了上述问题。首先, 我们选择浙江省 2003 年以后的数据, 此时改革已比较完善, 并且推广到全省, 不存在改革先后的差别。其次, 我们使用的是微观数据, 无论政治博弈的过程多么复杂,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对浙江、福建两省的是否进行“扩权强县”改革几乎没有影响。最后, 采用地域划分县辖企业是否“被试”也有较强的外生性。企业短期内对浙江、福建两省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制度也难以有直接影响。

因此, 上述讨论说明我们的研究内生性较弱, 即可以假设 $E(\varepsilon_{ijk} | d_j^k, d_j, d^k, \mathcal{X}) = 0$, 从而获得 β_j^k 的一致性估计。^①

(三) 指标设计

本文在被解释变量上, 用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来定义被解释变量企业发展速度。这也是度量企业成长的常用指标 (Lang et al, 1996)。同时, 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对销售收入和资产增长的扭曲, 我们用浙江、福建两省相应年份的工业品出厂指数对其进行了修正。

回归模型的关键解释变量为“扩权强县”改革, 在本文中是县辖企业与地理位置

^① 将模型 (2) 依前文的方法两次差分可发现, β_j^k 的一致估计量等于 $E[(\alpha_1 - \alpha_0) | \mathcal{X} u_k]$, 而 β^k 即是 u_k 。

浙江省的交互项。此外,微观层面我们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规模较大的企业可能已经完成先期投资,进入增长更为平稳的时期,具体指标是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2)企业财务杠杆(资产负债率):几乎所有的公司研究文献都认为企业的资本结构影响企业绩效,因此我们控制企业财务杠杆,指标计算方法为企业负债总额/企业资产总额。(3)人均工资增长率: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要素价格影响着利润函数,因此在回归中加入了企业的人均工资增长率。(4)企业类型虚拟变量:显然企业所有制会影响企业内部激励结构,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因此,我们引入企业类型虚拟变量,国有控股企业取 1,非国有控股企业取 0。

最后,考虑到不同行业的差异性,我们引入企业所在的二位数行业的虚拟变量;同时宏观形势和总需求会影响企业的发展,模型还控制了浙江和福建两省的实际 GDP 增长率,^①这也是比年份虚拟变量更好的刻画企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指标。

四 检验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微观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此数据库包括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和销售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其他工业企业,数据指标包括资产总量、销售额、债务、职工人数和工资等财务指标。由于浙江省在 2002 年“扩权强县”改革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根据研究需要,我们选取了浙江、福建两省 2003~2005 年注册在市区(包括市辖区)和县的全部企业数据。另外,浙江、福建两省 GDP 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等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浙江统计年鉴》和《福建统计年鉴》。

需要交代的是,微观数据中只有被解释变量和工资增长率用到了 2003 年的数据,其他解释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于 2004 年和 2005 年。

(二)描述性统计

由于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我们将全部样本区分为 4 个子集:浙江的县辖企业(实验组“被试”)、福建的县辖企业(实验组没有“被试”)、福建的市辖企业(控制组)和浙江的市辖企业(控制组),并将其重要指标描述性统计归结于表 1。

直观上看,实验组中是否“被试”效果还是明显的,无论是销售收入增长率还是资

^① 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GDP 增长率指标用相应年份两省的 CPI 增长率修正过。

产增长率,浙江省县辖企业的均值都高于福建省。这种区别既可能是由于“扩权强县”改革,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历史、文化和其他经济制度造成的,还可能由企业财务结构、行业前景、员工素质等个体差异带来的,所以还需进一步严谨地统计检验。

另外,表 1 显示,福建省企业的人均工资增长率平均高于浙江省企业。同时,浙江省企业的杠杆均值高于福建省企业,这可能是由于浙江省民间金融较为发达,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较低缘故。

表 1 企业个体差异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销售收入增长率	资产增长率	企业规模	企业杠杆	人均工资增长率
全样本	0.173 (0.268)	0.166 (0.290)	9.489 (1.026)	0.565 (0.211)	0.119 (0.276)
浙江县辖企业	0.191 (0.266)	0.175 (0.292)	9.399 (1.007)	0.587 (0.199)	0.118 (0.274)
浙江市辖企业	0.173 (0.260)	0.171 (0.287)	9.522 (1.014)	0.601 (0.201)	0.109 (0.265)
福建县辖企业	0.167 (0.296)	0.138 (0.294)	9.259 (1.040)	0.466 (0.217)	0.159 (0.308)
福建市辖企业	0.162 (0.282)	0.155 (0.293)	9.574 (1.057)	0.467 (0.211)	0.136 (0.296)

说明: (1)表中的变量是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2)销售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使用浙江、福建两省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调整过。下同。

(三) 回归结果分析

应用双重差分模型,我们分别以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结果列于表 2 和表 3。考虑到可能存在异方差,所有的系数都是稳健性方差估计。

表 2 报告了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我们最关心回归模型中浙江省与县辖企业的交互项系数,可以发现在控制企业个体差异和宏观环境后,“扩权强县”会让县辖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分别显著地提高 1.3 和 2.7 个百分点。

由于双重差分方法估计的是因果关系,说明浙江省扩大县政府的财政权限和经济管理权限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上,这种正面效应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 从激励理论看, 县政府财权的扩大一方面改善了当前财权与责任不相匹配的状况, 其发展经济的参与约束更容易满足, 可能会更着眼于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企业生存环境, 通过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获取税收和官员晋升的机会, 而不是侵犯产权获取短期的收益。另一方面, 财政“省直管县”也让县政府经济权限的扩大成为可信承诺, 县政府不必担心前景较好的招商引资项目被上级市政府夺走, 提高了县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

(2) 从信息收集和规制角度看, 由于中国县的面积、人口都相对较大, 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可能更有效率。首先, 县级政府辖区范围相对于地级市缩小, 其制定正确政策所需信息的维度减少。^① 其次, 县政府自主权扩大, 许多政策不需要请示市级政府, 减少了“委托-代理”层次, 加快了信息传递速度, 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再次, 投资审批、对外贸易等经济管理权力的下放使得管制层级降低、管制机关变少, 降低了企业被寻租的可能性。这对于中国转型过程中市场发育, 促进民间的创业和创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 从政府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看, 财权的下放可能弱化县政府从财政收入以外的渠道获取融资(如通过“城市投资公司”获取贷款)的激励, 从而减少了对市场资金的挤出效应, 降低了企业融资的难度。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 企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负, 证实了我们关于规模较大企业发

表 2 浙江省“扩权强县”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销售收入增长率	资产增长率
浙江企业	0.049 (8.68)***	0.052 (10.21)***
县辖企业	0.005 (1.06)	-0.028 (6.12)***
浙江省县辖企业 (“扩权强县”)	0.013 (2.25)**	0.027 (5.05)***
企业规模对数	-0.015 (3.75)**	-0.032 (30.85)**
国有控股	-0.015 (5.62)***	-0.044 (15.91)***
企业杠杆	0.018 (3.40)**	-0.031 (6.05)***
工资增长率	0.088 (21.90)**	0.081 (21.39)**
实际 GDP 增长率	0.413 (4.39)***	0.484 (5.24)***
常数项	0.070 (5.22)***	0.432 (9.35)***
观测值	60551	74435
调整后的 R ²	0.45	0.51

说明: (1)括号内是 t 值。(2)***、**、* 分别表示双尾检验在 1%、5% 及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3)控制变量还包括二位数行业虚拟变量, 但没有列出。(4)在回归中, 去掉了 3% 的异常值。(5)所有系数都是稳健性方差估计。下表同。

① 浙江各县级往往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情况, 支持发展本县的支柱产业, 总体来看是成功的, 形成了一大批专业化的县或市。比如义乌的日用小商品、绍兴的纺织面料、海宁的皮革制品、永康的小五金、嵊州的领带、诸暨的袜业、温州的打火机等等。

展更为平稳的猜想。企业财务杠杆系数在两个回归中符号有差异,原因可能是杠杆较高的企业可能通过债务融资完成了先期投资,因而销售渠道更丰富,产品质量也更高,销售收入增长也更快,但相应地,这些企业新的投资也会更为平稳,因而资产增长率更慢。另外,实际 GDP 增长率的系数值较大且非常显著,尽管时间跨度较短,但也部分验证了经济周期对工业企业增长的重大影响。

表 2 中国有控股企业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发展速度更缓慢。这也提醒我们,“扩权强县”可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不同。于是,我们将全部样本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分别回归,其结果见表 3。

表 3 “扩权强县”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

	非国有控股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	
	销售收入增长率	资产增长率	销售收入增长率	资产增长率
浙江企业	0.045 (7.68)**	0.047 (9.56)**	0.033 (4.68)**	0.041 (5.21)**
县辖企业	-0.000 (0.05)	-0.029 (5.24)**	0.017 (2.06)**	-0.024 (2.98)**
浙江省县辖企业 (“扩权强县”)	0.016 (2.32)**	0.028 (4.43)**	0.008 (0.79)	0.019 (1.93)*
企业规模对数	0.002 (6.56)**	-0.034 (8.76)**	0.011 (5.03)**	-0.023 (11.30)**
企业杠杆	0.025 (4.06)**	-0.025 (4.28)**	-0.007 (0.64)	-0.055 (5.10)**
实际 GDP 增长率	0.379 (3.50)**	0.377 (3.55)**	0.519 (2.73)**	0.860 (4.70)**
人均工资增长率	0.095 (11.66)**	0.084 (9.48)**	0.064 (7.61)**	0.070 (8.74)**
常数项	0.090 (5.81)**	0.462 (9.07)**	-0.007 (0.26)	0.277 (10.29)**
观测值	47580	59937	12971	14498
调整后的 R ²	0.47	0.51	0.52	0.57

观察表 3 可以发现,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基本相同,但在国有控股企业的样本回归中,关键解释变量“扩权强县”无论是系数值还是显著程度都下降了,特别是对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异于 0。原因可能在于:第一,由于国有企业自身效率较低,外部投资环境的改善无法转化为企业内在的激励机制,也就很难提高企业绩效。第二,放权到县以后,县域之间对要素的竞争让补贴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提高,政府基于税收和经济增长的考虑并没有对国有企业有过多政策上的支持。

这与 Qian 和 Roland (1998) 关于财政分权以后地方政府会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理论预期一致。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 县辖国有企业多为大型国有集团的下属企业, 其获取政策支持主要来自于较高级别的政府部门, 因而县政府的权力扩大对它们的作用很小。并且其税收和利润主要上缴上级政府, 基层政府对其收益的分享有限, 因此, 县政府对其支持的激励也有限, 而将主要的支持转向了非国有企业。这说明, “扩权强县”不但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 而且这种增长更多来自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 这也对浙江省长期以来民营经济发达、市场化水平较高有一定解释力, 同时说明, 向基层政府的放权可能对长期市场化改革有正面作用。

表 4 浙江省“扩权强县”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以浙江、江苏两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

	销售收入增长率	资产增长率
浙江企业	0.061 (7.89) ^{***}	0.076 (10.79) ^{***}
县辖企业	0.023 (1.35)	-0.032 (7.23) ^{***}
浙江省县辖企业 (“扩权强县”)	0.023 (5.36) ^{***}	0.068 (5.68) ^{***}
企业规模对数	-0.031 (5.12) ^{***}	-0.056 (10.76) ^{***}
国有控股	-0.023 (5.16) ^{***}	-0.059 (11.35) ^{***}
企业杠杆	0.021 (5.11) ^{***}	-0.056 (5.02) ^{***}
工资增长率	0.076 (12.32) ^{***}	0.092 (11.56) ^{***}
实际 GDP 增长率	0.561 (5.98) ^{***}	0.672 (6.35) ^{***}
常数项	0.191 (7.31) ^{***}	0.361 (9.57) ^{***}
观测值	69652	79442
调整后的 R ²	0.27	0.39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 较大的企业规模显著地提高了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更多存在于垄断行业中, 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更可能得到政府的保护, 也更容易获取政府的订单, 因而销售收入增长更快。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

中企业规模系数并不显著也佐证了这一点。

最后,在我们所有的回归中,人均工资增长率系数都显著为正,这与微观理论不符,显然是由于该变量的内生性造成的,因为企业成长速度的加快可能会提高员工的工资,这也可能会造成回归中其他变量系数的估计不一致。但根据 Woodrige(2000)的研究,只要该变量与关键解释变量线性不相关,则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仍然是一致的。我们用企业的人均工资增长率对“扩权强县”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了回归,发现它们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详见附表),因此,前文的统计结论是可信的。

表 5 “扩权强县”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
(以浙江、江苏两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

	非国有控股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	
	销售收入增长率	资产增长率	销售收入增长率	资产增长率
浙江企业	0.056 (6.25) ^{***}	0.063 (8.58) ^{***}	0.051 (7.89) ^{***}	0.073 (6.76) ^{***}
县辖企业	-0.019 (0.16)	-0.021 (2.13) ^{**}	0.037 (5.13) ^{***}	-0.041 (6.19) ^{***}
浙江省县辖企业 (“扩权强县”)	0.083 (2.61) ^{**}	0.108 (6.31) ^{***}	0.072 (0.32)	0.097 (0.29)
企业规模对数	0.061 (4.75) ^{***}	-0.029 (4.92) ^{***}	0.071 (6.91) ^{***}	-0.082 (8.12) ^{***}
企业杠杆	0.093 (5.78) ^{***}	-0.023 (7.81) ^{***}	-0.076 (4.69) ^{***}	-0.085 (6.56) ^{***}
实际 GDP 增长率	0.516 (5.13) ^{***}	0.672 (4.12) ^{***}	0.398 (5.21) ^{***}	0.769 (6.81) ^{***}
人均工资增长率	0.129 (9.31) ^{***}	0.092 (8.91) ^{***}	0.106 (7.19) ^{***}	0.182 (10.19) ^{***}
常数项	0.129 (6.29) ^{***}	0.362 (9.13) ^{***}	-0.096 (4.12) ^{***}	0.193 (7.71) ^{***}
观测值	55966	60763	13686	18679
调整后的 R ²	0.37	0.56	0.49	0.53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排除在样本选择中产生的偏差,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我们用江苏省 2003~2005 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作为控制组,以浙江省 2003~2005 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作为观察组进行了相同的回归,结果列于表 4。江苏与浙江同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外向型经济和社会文化传统也非常相近,但 2007 年以前政府层级

一直是“省-市-县”结构,因而相同的研究设计同样适用。表 4 的回归结果表明,浙江省县辖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更高,这与前文的结论是一致的,表明了“扩权强县”确实促进了县辖区内工业企业的发展,特别对资产增长率的效果更为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县政府通过提供良好投资环境来提高辖区内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表 6 浙江省“扩权强县”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以 2000~2002 年浙江省数据作为控制样本)

	销售收入增长率	资产增长率
2003~2005 年浙江企业	0.267 (9.16) ^{***}	0.151 (11.35) ^{***}
县辖企业	0.035 (0.79)	-0.078 (0.98)
2003~2005 年的浙江县辖企业 (“扩权强县”)	0.109 (6.35) ^{***}	0.087 (7.82) ^{***}
企业规模对数	-0.032 (8.87) ^{***}	-0.061 (9.72) ^{***}
国有控股	-0.092 (6.23) ^{***}	-0.105 (9.28) ^{**}
企业杠杆	0.035 (6.56) ^{***}	-0.057 (7.21) ^{***}
工资增长率	0.103 (12.76) ^{***}	0.091 (11.39) ^{***}
实际 GDP 增长率	0.397 (5.26) ^{***}	0.516 (6.13) ^{**}
常数项	0.103 (6.61) ^{***}	0.267 (9.79) ^{***}
观测值	121102	148870
调整后的 R ²	0.46	0.51

表 5 是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回归的结果,结论与浙江、福建两省 2003~200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样本回归中获得的主要变量估计结果基本相同,无论销售收入增长率还是资产增长率,“扩权强县”对县辖的非国有企业有显著可观的正面影响,而对国有企业对制度的变化并不敏感。

表 5 中以浙江、江苏两省 2003~200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样本回归中获得的主要变量估计结果与浙江、福建两省 2003~200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样本回

归中获得的主要变量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我们前文回归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即“扩权强县”对经济增长、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有显著的正面效应。这说明,“扩权强县”对县辖国有企业的增长效果较微弱,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因而“扩权强县”可能对市场化改革有长期的正面作用。

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我们用浙江省 2000~200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相同的回归。浙江省 2003 年在全省全面实行了“扩权强县”,把绝大多数原本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县级市(县),所以我们以浙江省 2000~2002 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作为控制组,以浙江省 2003~2005 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作为观察组进行了相同的回归,列于表 6。表 6 的回归结果表明,2003 年(包括 2003 年)后浙江省县辖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显著更高,这与前文的结论是一致的,表明了“扩权强县”确实促进了县辖区内工业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对资产增长率的效果更为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县政府通过提供良好投资环境来提高辖区内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表 7 “扩权强县”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
(以 2000~2002 年浙江省数据作为控制样本)

	非国有控股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	
	销售收入增长率	资产增长率	销售收入增长率	资产增长率
2003~2005 年浙江企业	0.076 (9.78) ^{***}	0.087 (10.96) ^{***}	0.033 (6.35) ^{***}	0.041 (7.46) ^{***}
县辖企业	-0.013 (0.12)	-0.029 (6.74) ^{**}	0.017 (2.56) ^{**}	-0.024 (3.56) ^{**}
2003~2005 年的浙江县辖企业 (“扩权强县”)	0.021 (2.19) ^{**}	0.043 (6.56) ^{**}	0.052 (1.96) [*]	0.028 (5.23) ^{**}
企业规模对数	0.0013 (1.02)	-0.065 (13.88) ^{***}	0.055 (6.35) ^{***}	-0.027 (12.13) ^{***}
企业杠杆	0.081 (6.12) ^{***}	-0.067 (5.53) ^{**}	-0.051 (7.43) ^{***}	-0.067 (7.12) ^{***}
实际 GDP 增长率	0.435 (4.12) ^{***}	0.673 (7.67) ^{**}	0.869 (3.51) ^{***}	0.916 (6.20) ^{**}
人均工资增长率	0.127 (11.25) ^{***}	0.167 (12.36) ^{***}	0.128 (9.78) ^{***}	0.158 (12.21) ^{***}
常数项	0.121 (6.92) ^{***}	0.563 (9.63) ^{**}	-0.139 (5.12) ^{***}	0.398 (8.32) ^{***}
观测值	95160	119874	25942	28996
调整后的 R ²	0.41	0.62	0.36	0.57

表 7 是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回归的结果, 无论销售收入增长率还是资产增长率, “扩权强县”对县辖的非国有企业有显著可观的正面影响, 而国有企业对制度的变化并不敏感。

以浙江省 2000~ 200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的稳健性回归中获得的主要变量估计结果与浙江、福建两省 2003~ 200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样本的回归基本一致, 表明我们前文回归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即“扩权强县”对经济增长、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有显著的正面效应。这说明, “扩权强县”对县辖国有企业的经济增长影响较微弱, 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 因而“扩权强县”可能对市场化改革有长期的正面作用。

五 结论

“扩权强县”是优化省以下政府层级和权限的重大改革, 大部分试点改革包括财政“省直管县”和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县两个维度, 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竞争进一步“基层化”。理论上, 财政上“省管县”降低了“市刮县”的可能, 改善了分税制改革以来基层政府财权和责任严重脱节的状况, 促进了公共品的提供, 弱化了政府的“攫取”倾向, 降低了对信贷市场的挤出效应。县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扩大也有利于减少委托代理层次, 发挥自身的信息优势, 做出更正确的政策和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另外, 市级权力的下放也减少了管制机构和层级, 从而促进了市场发育和创新。

我们的研究表明, “扩权强县”确实促进了县辖区内工业企业的发展, 特别对资产增长率的效果更为显著, 这进一步验证了县政府通过提供良好投资环境来提高辖区内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另外, 有证据表明, “扩权强县”对县辖国有企业的增长效果较微弱, 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 因而“扩权强县”可能对市场化改革有长期的正面作用。

地方分权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 但也是造成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 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关键和困难之一便是寻找政府上下层级之间集权和分权的平衡点。即将推广到全国的财政“省管县”改革, 直接目标是在分税制以来的税收体系没有大改变的前提下, 通过县财政与省财政对接的方式改善县级财政, 这也是寻求此平衡点的重要尝试。本文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在于对它的正面作用提供了一个经济增长方面的证据。但限于篇幅, 大量文献中提到的财政分权弊端本文并未涉及, 余下的工作将是对“扩权强县”的其他效应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and 研究。

参考文献:

- 才国伟、黄亮雄 (2010):《政府层级改革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绩效研究》,《管理世界》第 8 期。
- 陈抗、A. L. Hillman、顾清扬 (2002):《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经济学(季刊)》第 7 期。
- 陈锡文 (2002):《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主编),山西出版社。
- 傅勇、张晏 (2007):《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第 3 期。
- 梁若冰 (2009):《财政分权下的晋升激励、部门利益与土地违法》,《经济学(季刊)》第 1 期。
- 聂辉华、李金波 (2006):《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季刊)》第 1 期。
- 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 (2005):《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中国社会科学》第 6 期。
- 史宇鹏、周黎安 (2007):《地区放权与经济效率:以计划单列为例》,《经济研究》第 1 期。
- 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 (2007):《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经济研究》第 1 期。
- 张军 (2007):《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经济学(季刊)》第 1 期。
- 张通、欧文汉、方向阳、姜冰、张峥、王志刚 (2006):《改革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思考和建议》,国务院财政部办公厅研究报告。
- 张晏、龚六堂 (2005):《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 1 期。
- 赵山、潘孝挺 (2010):《民间金融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工作论文。
- 周黎安 (200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第 6 期。
- (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 7 期。
- (2008):《转向中的地方政府》格致出版社。
- 周黎安、陈烨 (2005):《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经济研究》第 8 期。
- 周业安、冯兴元和赵坚毅 (2004):《地方政府竞争与市场秩序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 周业安、章泉 (2008):《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管理世界》第 3 期。
- Cai Hongbin and Treisman, D. "State Corroding Federalis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 pp 819– 843
- Cai Hongbin and Treisman D. "Does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Discipline Governments? Decentr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 pp 817– 830
- Cao Yuanzheng Qian Yingyi and Weingast Bany R. "From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o Privatization, Chinese styl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999, 7(1), pp 103– 131.
- Jin Hehui Qian Y. Y. and Weingast B. R.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 pp 1719– 1742.
- Jin Jing and Zou Hengfu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orking paper,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The World Bank 2005
- Lang Larry Eli Ofek and Stulz Rene M. "Leverage Investment and Firm Growth."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6 40 pp 3– 29.
- Li H. and Zhou L.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9– 10), pp 1743– 1762.

Li, J Y fu and Liu Zhiqiang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2000, 49(1), pp 1- 21

Maskin, E.; Qian Y. and Xu, C. “Incentive,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For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0, 67(2), pp 359- 378

Meyer Bruce D. “Natural and Quasi- Experiment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1995, 13(2), pp 151- 161.

Montinola G.; Qian, Y ingyi and Weingast Bery.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1995, 48(1), pp 50- 81

Musgrave R.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1959 New York: McGraw- Hill

Oates W. E. *Fiscal Federalism*. 1972,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Qian Y ingyi and Roland G.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5), pp 1143- 1162.

Qian Y ingyi, Roland G. and Xu C. “Why Is China Different from Eastern Europe? Perspectives from Organization Theo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 pp 1085- 1094.

Qian Y ingyi and Xu, C.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M- 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 State Sector”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993, 1(2), pp 135- 170.

Qian Y ingyi and Weingast R.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s: Market- Preserving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1996, 1, pp 149- 185

——.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1(4), pp 121- 138.

Tiebout Charles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 pp 416- 424

Weingast B.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 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5, 1(1), pp 1- 31.

Woodridge, Jeffrey M.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South- 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2000

Zhang T. and Zou, H.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67, pp 221- 240

附表 工资增长率与其他重要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浙江企业	县辖企业	浙江县辖企业 (“扩权强县”)	企业规模	企业杠杆	实际 GDP 增长率	常数项
工资增长率	- 0.044 (0.58)	0.021 (0.52)	- 0.015 (0.56)	- 0.000 (0.43)	- 0.025 (4.99)***	0.772 (8.89)***	0.072 (5.79)***
观测值							74435
调整 R ²							0.05

说明: 括号内是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 及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截稿: 2010 年 12 月 责任编辑: 宋志刚)